

智者为王

智者为

王

下

向 洪 李勇军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 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网址: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责任编辑 杨宗平

邓 燕

封面设计 魏晓舸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校对 伍登富

智者为王(上·下)

向 洪 主编
李勇军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西南勘查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45.25 字数 1051 千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4746-0/K·643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68.00 元

“现象”阐释者

——胡塞尔

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1859 ~ 1938), 德国哲学家, 20 世纪现象学派创始人。生于现在的普罗斯涅兹城, 系犹太族后裔。他早先攻读数学、物理学, 1881 年获博士学位, 1883 年起在维也纳追随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F·布伦塔诺钻研哲学, 先后在德国哈勒、哥廷根和弗赖堡等大学任教, 1938 年病逝于弗赖堡。胡塞尔的大量著作有些发表于生前, 有些出版于死后, 有些仍在编辑整理中。重要的著作有: 《算术哲学》(1891)、《逻辑研究》(1900 ~ 1901)、《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1910)、《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1929)、《笛卡尔沉思》(1950)《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1954)、《第一哲学》(1959) 等。

现象学之门

1900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出版，这本书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使胡塞尔一夜之间成了名人，该书集聚了胡塞尔几十年的心血，是他长期以来默默工作的结晶，这也是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现象学运动的开端。当时胡塞尔42岁，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个讲师，但该书的发表使许多热衷于现象学研究的人们开始云集于他的门下。此书在1913年和1921年出了第二版，1922年和1928年分别又出了第三、四版（此书的英译本出版较晚，是1970年由N·芬德莱译出的）。胡塞尔的声誉渐渐开始高涨起来。

但胡塞尔并不甘心于此，他继续埋头工作，他一直想努力寻找一种不建立在心理学上的纯粹逻辑以反驳当时很流行的心理主义，当然这也反驳了他1891年《算术哲学》中的心理主义思想。在1897年3月14—15日致那托普的一封信中，胡塞尔说：“可纯粹逻辑应有独立的领域[……]，它与所有心理学无干系。……心理学家们误解了逻辑规则的意义……”胡塞尔这里所说的“纯粹逻辑”和《逻辑研究》一书定名中的“逻辑”都不应在狭义上理解，而应理解为一种广义的认识框架。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发表后的1921年8月22日致G·阿贝瑞希特的一封信中指出：“实际上，我在尝试一种新的认识批判，但我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完，只是开了个头，它还是继续摸索前进的大方向。”

其实，以上的纯粹逻辑或认识批判与所谓现象学没沾一点边，但为何说此书的发表引起了规模宏大的现象学运动呢？这在胡塞尔1918年致E·斯皮让哥的一封信的草稿中可以看出一些因

子，在那封信的草稿中，胡塞尔说：“现象学与逻辑的关系并不比与伦理学、美学和所有类似学科的关系更亲密，《逻辑研究》是逻辑的现象学的关键性开端：由此打破了普遍现象学的第一个缺口……”

也从这里，胡塞尔开始踏上了他的现象学之路。

现象学之路

1911年，也就是从《逻辑研究》中的关于现象学的首次实践性尝试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中的现象学方法的过渡期间，也即是酝酿从“描述的现象学”向“先验的现象学”转变的过渡期间，胡塞尔发表了他的又一篇重要著作——《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这是一篇关于现象学的最终意图的宣言，同时也是一篇针对各种阻碍现象学实现其意图的思想的论战性文章。

在胡塞尔生前，除了这篇文章，从1900年到1911年这个期间，胡塞尔几乎没发表过什么文章，因而从年代上说，这篇文章在胡塞尔的思想发展中占据着一个特别的位置。尽管在这篇文章中后期现象学中的高度发展了的晦涩的术语并没有出现，甚至一些现象学中的基本论题也没有出现，然而如果人们不是希望这篇文章能给出任何胡塞尔从《逻辑研究》到《观念》的思想发展线索，而是希望给出一些关于作者终其一生竭力追求的哲学的科学理想，特别是把现象学视作这一科学理想的努力的提示的话，那么我们便会发现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抗击阻挡哲学成为真正科学的各种思想构成本文一个重要内容。在文中，胡塞尔抨击了三种哲学倾向，即自然主义、历史主

义和世界观哲学。前者是早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就有了的关键论题，也是胡塞尔在放弃其早期的心理主义后半生坚决反对的哲学倾向，后者则是首次出现于胡塞尔的著作中的主题。与其日后的著作比较，胡塞尔对当时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和各种黑格尔式的世界观哲学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达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这并不是说在写完《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后，胡塞尔就放弃了这个题目，恰恰相反，对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的关注引起了胡塞尔对历史和哲学的关系的思考，这一思考构成了日后《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然而这篇文章的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此，而是它以明确的语言宣布了胡塞尔现象学思想的梗概：哲学的目的在于成为具有严格科学性的哲学，整部西方哲学史没有能给出一种真正哲学，其原因是没有把现象学作为哲学的基础，因而只要哲学没有沦丧它的这一治疗目的，那么哲学就只能是现象学。胡塞尔对自然主义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理想为基础的，甚至从一开始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以哲学的科学理想为其探索动因的。“哲学从最早开始就要求成为严格的科学。不仅如此，它还要求成为能够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能够使得从伦理——宗教的观点来看是受纯粹理性的规范规整的生活成为可能的科学。”

接着，胡塞尔阐述道：“自然主义观点的诱惑，在此阻挡了通向一种无比丰产的伟大科学的道路，这种科学一方面是完全科学的心理学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则是真正的理性批判的场地。”“一味沉浸在历史上的东西时，强迫自己进行历史考察活动，还希望通过折衷的精心拼凑或不合时宜的振兴来达到哲学的科学——所有这些只能导致毫无指望的努力。”我们仿佛看到了胡塞尔当时那种尖锐而激烈的锋芒。

然而真正的哲学方法又是什么呢？通向严格科学的哲学的道

路在哪里呢？胡塞尔回答道：“要寻找的动量不应该在哲学中，而是在事物和联系这些事物的问题中。”

我们仿佛看到了现象学研究的曙光。

布伦塔诺和胡塞尔

在通向现象学的途中，我们插入一段布伦塔诺与胡塞尔交往的一段故事，这无疑可以使我们一窥历史上作古正经的哲学家有血有肉的一面。

胡塞尔其实是在其学习生涯将告结束时才熟识布伦塔诺的。他在 1876 年去莱比锡读大学，在那里学了三个学期。除研习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外，他还出席了冯特的哲学讲座，不过所获甚微。1878 年 4 月，他转学到柏林就学于克罗内克尔和魏厄施特拉斯门下，在后者的影响下，他放弃了天文学完全投身于数学。而同是数学哲学教授的克罗内克尔最先唤起了他对哲学的兴趣。柏林的这两位老师都认为整数是数学的基本观念，我们在《算术哲学》中也可以看到这个观点。胡塞尔心理学评论的起点就是要澄清整数观念，这与他这两位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此外，胡塞尔对哲学的兴趣还应部分地归功于 F·鲍尔森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伦理学教程。

1881 年 3 月，胡塞尔离开柏林到维也纳在柯尼希斯贝格尔指导下撰写论文。1883 年 1 月 23 日他获得博士学位，时年 22 岁。他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变量演算。”随后他回到柏林，在 1882～1883 年的学期中充当魏厄施特拉斯的助教。此后他再次赴维也纳学习哲学并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布伦塔诺。胡塞尔早在其他的著述里就告诉了我们：他之所以学习布伦塔诺的课程完全是出

于好奇，因为他想见识一下这个引起过巨大反响的人。

胡塞尔一下子为布伦塔诺所倾倒。他在《回忆布伦塔诺》一书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正是在布伦塔诺的影响下，胡塞尔最终决定以哲学作为其终身职业。“我的哲学兴趣日益浓厚，我不知道自己应当继续研究数学还是彻底投身于哲学，正当这个时候，布伦塔诺的课程让我作出了选择。”使胡塞尔深受触动的不仅是布伦塔诺的人格魅力，而且是他的方法，即他那种提出问题并清晰地加以解决的敏锐方式。他还是从这个榜样中汲取了勇气从而把哲学当作他的终身事业，因为他发现哲学也是一种严肃的劳动，值得以严格科学的精神去对待。他非常欣赏这种精辟的论证，“对含糊不清的东西进行分析，对全部哲学观念追根寻源一直到它们在直观中的最终来源。”他特别提到与几位同学在布伦塔诺家进行的一次次长谈。布伦塔诺甚至在暑假时邀胡塞尔到沃夫岗湖去旅游，他们一道散步划船。因此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学术上的界限而成为一种私交。

尽管他们私交甚笃，但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通信却寥寥可数。胡塞尔本人对此作出的解释对于了解他们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胡塞尔对他的导师十分尊重，但他却无缘成为布伦塔诺学派中人。布伦塔诺对于任何背离其思想的事情极为敏感。胡塞尔告诉我们，布伦塔诺渐渐对他粗暴起来，这使他极为痛苦。此外，胡塞尔不敢向这位“逻辑大师”披露他的那些尚未成形的想法，因为后者常以其“高明的辩术”赢得辩论，而不是通过展示其明晰的思想而令这位以前的学生折服。因此，俩人在学术上的分歧日益拉大，尽管他们的私交依然密切。胡塞尔在《算术哲学》的献词中对布伦塔诺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胡塞尔在布伦塔诺那里只学习了两年，包括两个完整的学期（即1884~1885年和1885~1886年的冬季学期）。1886年他前往

哈勒在施通普夫的指导下撰写教师资格论文（这将使他获得大学讲师资格）。1887年成为讲师后，他在暑假再次访问了布伦塔诺。此后，俩人睽隔数载，直到1908年才在弗罗伦萨再次相聚。这次会面时，俩人仍然谈论了不少有关哲学的问题。胡塞尔试图使布伦塔诺对他的现象学方法和他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多少有一些了解，但二人并没有达成共识。

胡塞尔本人承认，布伦塔诺的方法中有两点使他印象极深，即他在直观中探讨全部观念的基础以及他在思考和论证问题时表现出的敏锐雄辩的方式。不过，我们知道他对这两点并没有给予同等的重视。尽管布伦塔诺的论证技巧给他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但真正在他思想中扎下根的还是布伦塔诺的直观分析方法。胡塞尔在这种直观分析的原则上对布伦塔诺提出了审慎的批评：“无论他的分析如何透辟和精彩，他从直观向理论的过渡都显得过于仓促。”我们已经知道，布伦塔诺惯于利用其论证技巧来压制其反对者，即使他们可能占有某种原原本本的直观。在《逻辑研究》中，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胡塞尔指出的布伦塔诺的“伴随意识”理论就是这样一种“人为”理论的证据。在其关于必然判断的理论中，布伦塔诺还轻巧地略过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对共相的知觉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他对时间的分析之中。

胡塞尔后来发现了布伦塔诺的一个最重要的失误，即他的“自然主义”观点。布伦塔诺认为精确的自然科学是严格科学的理想。因此，他与德国唯心主义格格不入：对他来说，这不是一门科学而是神秘主义。胡塞尔最初也接受了这个看法。他说，只是在很久以后，他才发现尽管唯心主义不是科学，但其动机却是应当得到高度重视的。他认为，在康德和后康德的德国唯心主义者的思想中包含着一些正确的推测和直观。他们所缺少的是科学方法。在胡塞尔看来，正是由于布伦塔诺关于严格科学的特殊观

念，使他不能看到这些思想家的伟大之处，而只是把他的哲学视为纯粹的堕落。当胡塞尔在 1919 年写下这段评论时，他认为先验现象学方法是惟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正是这个方法可以把德国唯心主义的探索提高到严格理论的高度上。然而这种关于严格科学的新观念与布伦塔诺的思想特别是他的“直观主义”具有某种直接的关系。

因为其实一开始胡塞尔与他的导师布伦塔诺就有一种心有灵犀血肉相通的触动。尽管他俩的哲学道路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生活却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即他们一开始都意识到了哲学的危机。这种危机构成了他们的改造要求以及使命意识的背景。1930 年胡塞尔对某种人的绝望情绪作了如下描述，他“不幸爱上了哲学，并且作为一个面对哲学的混乱局面的学生和新手，他不得不作出选择，但他马上发现他实际上别无选择。因为所有这些哲学都不是在寻求一种真正的无预设性，并且没有哪一种哲学是产生于哲学所要求的那种自主的自我辩护方法。”

布伦塔诺也有类似的体验。他在年轻时代已经饱尝哲学的混乱局面所带来的痛苦。在他成长的岁月里，德国古典唯心论体系的危机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在他看来，谢林的哲学不过是一个“狂想的舞台”。他称黑格尔的思辨是“人类思维的最大堕落”。1874 年在维也纳的就职演说中，他生动描述了这种绝望情绪，这个讲演讨论的是“哲学领域中沮丧状况的原因”。人们之所以对哲学失去信心不仅是因为哲学家们的分化，而且是因为它缺乏任何发展。布伦塔诺勾画出哲学与自然科学的那种令人不安的对立，因为后者取得了渐进性的进展。这些科学的成功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瓦解了哲学的自信。在自然科学中，知识意味着力量。而哲学则表明它自己在实践中是完全无用的。

因此，哲学的境况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事实之中：即唯心论

哲学的瓦解和自然科学的成功。这些发展是否将导致哲学的终结呢？施通普夫指出，布伦塔诺从年轻时代就在忍受着这个问题的煎熬，但是他在 22 岁时已经原则上发现了解决的办法。他发现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局面。我们不当因为唯心主义哲学的瓦解而感到沮丧，反而应当感到庆幸。它代表着一种要求真正科学的觉醒意识。此外，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已经初露端倪的新时期不会再次衰落，因为哲学已经找到了它的真正方法。那么，这个真正的方法是什么呢？

布伦塔诺所期待的拯救哲学的方案既简单又有效。既然哲学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兴起而走向衰落，那么，我们不妨拿来它们的方法。在 1866 年的教师资格论文中，布伦塔诺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名言：“哲学的真正方法无非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如果说占星术和炼金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已经转变为真正的科学，那么唯心主义的哲学也将被科学的实证哲学所取代。这种哲学不应寻求对事物本质的洞观，而应通过对现象的耐心观察以达到普遍的规律。哲学家并不具有谢林那种理智直觉意义上的无所不见的眼睛，他凭借这双眼睛可以超越归纳方法而看到本质。当哲学以自然科学为楷模时，对它的所有反对意见都将烟消云散。哲学的分裂局面将从此结束而代之以一个哲学。它像一门自然科学那样循序渐进地发展。因此，哲学的黄金时代并不在我们的背后，而在我们的前头。

那么哲学会不会因此失去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呢？它是否仍然具有自己的领域呢？布伦塔诺认为这不是个严重的问题。他简单地把哲学等同于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是最基本的哲学学科，而其他哲学门类（伦理学、逻辑学、美学）不过是一些分支，布伦塔诺像康德一样认为各门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等级关系。这是一个依其复杂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顺序，每一后来科学的发展依赖

于较早出现的科学。其顺序如下：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数学产生于古代，物理学兴起于 17 世纪，化学出现得更晚，而生理学依照布伦塔诺的看法是从我们这个时代才开始的。如此看来，一门真正科学的心理学在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间之后才出现是不足为怪的。所以，指望这门科学现在就为我们提供一些实用的结果实在为时过早。然而这些结果迟早会出现，布伦塔诺对这种前景充满信心。一旦心理学运用自然科学的看法去工作，即在事实观察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法则，人类的崭新未来就会到来。

哲学的真正方法无非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个论断具有一种纲领性的意义。布伦塔诺谈到了一种普遍的革命。在看到他的学生们对这个新的方法表现出的热情时，他掩饰不住骄傲的情绪。1866 年他开始在沃尔茨堡执教时，哲学的位置是由谢林和巴德尔的追随者所把持。“讲课大厅空空荡荡，不知是哪个大胆的学生在门上用大写字母写‘废品工厂’的字样。”但是当布伦塔诺开始为这些学生授课之后，他唤起了他们的热情。在他六年之后告别沃尔茨堡时，没有哪门课程能够像哲学课一样吸引这么多的学生。“我现在仍能看到那些年轻人坐在我面前，他们通常挤到一起，在写字时，他们的胳膊互相碰撞着。”在维也纳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想见年轻的胡塞尔坐在这些学生中间聆听这位受人尊敬的大师讲课时的情形。布伦塔诺对新方法的信心强化了胡塞尔从他身上发现的那种崇高的使命感。“他十分自信”，胡塞尔回忆说，接着他补充道：“我几乎要说，他对于其使命的单纯信念构成了其生活的主要事实。”

但后来布伦塔诺逐渐意识到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方面出现的问题。他在《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中已经对某些不良后果进行了批评。

错误观点之一是为了把心理学还原为生理学而抹煞了物理现象与生理现象的区别。另一个错误是在对有待说明的现象进行恰当描述之前便着手进行说明。第三个论点引入了一个新的内容。自然科学有时被指责为混淆了规范与自然法规的区别，这尤其表现在诸如逻辑、伦理学和美学等学科中。从这个立场出发，人们相信只有在关于“应当”的研究被关于“必须”的研究取代之后，科学工作才能开始。

胡塞尔在后来撰写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一书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坦率承认他本人在许多方面是布伦塔诺的继承者。他像布伦塔诺一样希望哲学在人类生活中发挥其指导的意义和作用。胡塞尔认为，一种合乎道德的负责的生活惟有诉诸科学才是可能的，这是西方文明的基本观念。这个理想产生于古希腊，复兴于启蒙时代，然而却在实证论中获得了一种不幸的表达形式。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科学”这个概念最终为自然科学所垄断，胡塞尔像布伦塔诺那样指出以实证方式为规范科学奠定基础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谬的。这项工程惟有凭借先天分析才是可能的。胡塞尔深化了这种分析并最终确立了本质直观的学说。此外，胡塞尔还拒斥当时以“世界哲学”面目出现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它也是对自己科学的科学理想的挑战。实证主义是科学的哲学的一种错误形态，而历史主义是对它的否定。在胡塞尔看来，后者放弃了启蒙和文艺复兴的理想。然而我们要拒绝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在自然科学影响下所走的错误道路。胡塞尔把向非理性主义历史观的飞跃视为对自然主义挫折的一个反应，即“软化和削弱科学冲动的”一个象征，因而是人们必须以理性的名义加以反对的东西。我们将会看到，当胡塞尔撰写这部著作时，他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就其彻底程度而言已远远超过了布伦塔诺。他的批判不止局限于自然科学方

法的界限问题。

布伦塔诺和胡塞尔早期思想的根本特征在于将两种科学观念体系并列起来。而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布伦塔诺把自己限制于心理学的基础之上，而是在于胡塞尔打破了这个樊笼转而承认一种超越于意识的世界。二人都立足于心理学之中。如果说，胡塞尔可以指责布伦塔诺，那是由于后者没有看到“单纯具有”一种内容与对某种内容的客观性把握是有区别的。

现象学殿堂

1913年，胡塞尔的《趋向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I》在胡塞尔本人主编的《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第一卷上首次发表，1922年，本书出了第二版，由胡塞尔本人改正了一版中的一些印刷错误、内容标号，并稍稍改动了第一节的注释。1928年，本书出了第三版，但却又重蹈了一版中的所有错误，因此，在全集本出版之前，1922年二版本是最好的版本。1950年，胡塞尔档案馆开始着手编辑《胡塞尔全集》，以后陆续出版了标题为《趋向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第三、四、五卷，其中不但包括久已面世的《观念I》，还包括胡塞尔本人在后续年代积累的对《观念I》的许多注释、说明以及修改，另外还有本书的第二、三册也一同刊布出来，这两册的内容在此之前一直是手稿的形式保存的，其中讲到许多重要问题。至此，整个《趋向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简称《观念》）一书才算全面完成。本书有英译本，是鲍埃斯·哥布森于1931年译出的，但由于译者不可能看到新增的众多补注和第二、三册，因此这个译本远不完全。另1982年出版的科尔斯腾英译本，是据

全集本译出的，但也仅有《观念 I》。

这本书是胡塞尔在现象学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他最完备、最成熟、最成体系的著作，是其心路历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本书共有八九百页篇幅，但对于胡塞尔的这一努力，历来褒贬不一。受胡塞尔《逻辑研究》影响的一大批哲学家，包括海德格尔等人，对他的先验现象学转向表示不满，他们依照各自对现象学的理解，发展了各自的哲学学说；胡塞尔本人和其后期的一些学生则认真构建先验现象学体系，使其不断完善。这两种方式的努力以互补的形式形成了在本世纪有决定性影响的现象学思潮。

胡塞尔在这本书的第一卷里，曾允诺说要在下一卷中阐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关系问题。他从没有考虑发表第二卷，该著作在他去世后被收入他的全集里。我们所看到的第二卷全面地探讨了所谓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态度及其相互关系。

在这一节中，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观点出发来研究《观念》第二卷的核心问题。在胡塞尔的早期著作中，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或现象学）的关系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观念》第二卷终于对自然和精神的问题展开了详尽的讨论。人们通常认为，胡塞尔在论述“精神世界的构成”的第三部分试图把既有的精神科学并入现象学中。而其实《观念》第二卷中包含着更多的内容。胡塞尔在这里是在与自己过去的问题决斗。而这些在其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第二卷的钥匙。

在第二卷中，胡塞尔深入阐明了自然主义态度。胡塞尔把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领域界定为“实在物的全体，它们或者本身是物质自然，或者以物质自然为根据”。而我们在这种态度中发现了一种“不断延伸的基本假定”。

首先是对自然、物理自然的假定，根据这个假定，其他那些被称为自然的东西是从某种以自然为根基的存在获得其意义的。我们在物理自然的中心位置遇到了某种其属性并不具有严格物理含义的东西，这就是作为“身体内部实在文件之基础的心灵”。它从根本的意义上看是以自然为根基的，胡塞尔称它为广义的或第二性的自然。这种意识观点就是自然主义那种“支配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统觉观念。”

胡塞尔还对入本主义态度进行了刻画，我们从中发现《逻辑研究》的（心理学）现象学的立场。他在描述这种人本主义时所使用的概念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狄尔泰的影响。“我意向性地指向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性的、具有一种视界结构的周围世界，它不能被解释而只能被描述。这就是后来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与我自己的关系不是因果性而是意向性的。对这个世界中的趋势我既可以顺从又可以抵抗。选择完全是我的自由行为问题。在我、世界和我们试图通过精神科学来加以‘理解’的他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动机关系。”

这种把意识从自然态度的局限中解释出来的新观点将入本主义立场彻底化了，并且赋予了它某种绝对性。这是惟一具有本体论的有效性立场。自然主义的思维依据是对自然的非法绝对化，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对意识的自然化。胡塞尔由此走向了一种彻底的统一性观点。绝对意识是一切存在的根源。自然——从根本上的物理自然——只有在绝对意识中才能够被构成。

当然，这种解决方案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现在，自然主义观点必须屈从于入本主义或现象学的观点（后一个概念要准确一些，因为在胡塞尔看来，人就是实在的个人，而意识仍被认为是与某个身体联系的）。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在何种程度上仍然可以得到合理性辩护？如果说将意识当作一种